

鲁迅周年祭日 在“陕公”大会上演辞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毛 泽 东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的党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的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更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

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蒲列汉诺夫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给敌人作见面礼（我记得大意是如此）。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所有他领导下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的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倒它。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色彩。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了上述这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功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重 要 的 历 史 文 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出的三个电报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鲁迅先生的斗争生活始终是亲密关怀、支持并给以高度评价的。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当时革命根据地工农政权，除发出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外，还发出了致国民党中央与南京政府、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两个电报。

唁电的内容是：“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电文中开头说：“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电文认为：“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

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在致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电文中提出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象；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废止鲁迅先生生前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等八项具体建议。并认为表扬鲁迅先生也就是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毫无疑问，上面所引述的电文，不但反映和说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意，充分而切实地描绘和估价了鲁迅的伟大的面貌和精神，同时也是研究鲁迅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至于电文中所提到的纪念鲁迅的建议，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不能实现是可想而知的；只有在今天，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更大的规模和行动来纪念鲁迅先生。

录自《文艺报》一九五六年《鲁迅纪念专号》，本刊作了分段。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题词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

周 恩 来 廿七、十、十九

汉口《新华日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

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祭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周 恩 来

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先生逝世后，中国就从内战进入抗战。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不幸抗战才告结束，又回到了内战。内战是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所希望的事，总算在人民大众的努力之下实现了，而且取得了胜利。而现在他的祖国却还有着内战，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感到难过的。多少年来，全国人民个个祈求民主、独立、团结、统一，日本投降已经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怎么能叫人不失望、不悲痛？

鲁迅先生逝世那年，国内就已进行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来。我个人对此更有说不出的难过。但是人民既然一致的有了这个要求，只要能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和平民主统一争取到的。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的遗像面前，在各位人民的面前，说明我们的信念和努力：我们决不放弃和平统一谈判，即使被逼得为自卫而反抗，也仍要力求得和平统一而努力，我今天就这样的郑重作这个誓言。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的立场。鲁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动派，对

于反动派即所谓“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过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暴君、独裁者，结果都一个个的倒下去了，为后世所唾骂；但是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奴隶、被压迫者的农民，还是牢牢的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一切都为人民，所以我们应该站在鲁迅所站的立场，朝着鲁迅所走的方向，象牛一样的为人民去努力奋斗。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

上海《文汇报》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

编者附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文化界举行规模盛大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其时国共和平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周恩来同志于百忙中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发表了义正辞严的演说。十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祭上的演说》为题，刊载了周恩来同志这篇重要演说。

我也来纪念鲁迅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

叶 剑 英

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文艺家”，或称之曰“文化人”，当着他逝世的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一类半吊子的“文艺家”或“武化人”，对于文艺，既无天才，又无研究，对鲁迅生平的了解非常肤浅，甚至茫然，那么当着人们热烈的纪念他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欲无言。”

“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虽然他目前是革命军底马前卒——叶附），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

我们不是象牙塔里的绅士，我们和鲁迅一样痛恨那屠宰场中的操刀人，当着前进的人们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今天，我们——就叫“武化人”吧！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新军的主将来纪念他，我想，也是合适的。

我们研究鲁迅一生的战斗历史，不仅要学习鲁迅一生的战斗精神，而且也要学习鲁迅惯用的战术。鲁迅生平作战，是持久的，强韧的。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他主张战斗是要带“兽性”的，“兽性”就在于有“咬劲”，一口咬住就不放，拚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是韧的战争。

鲁迅的“韧战”，是与伟大的军事家克鲁什维茨所说的相同，克氏说：“战争胜利的艺术，是定出重要与决定的目标，用韧力和顽强的态度去追求它。”这就是说，一切战斗特别是抗日战争，没有韧力，就不能持久的斗争而取得胜利。

鲁迅惯用的战术是“壕堑战”，他以为打仗就要像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一步的前进。

这种壕堑战，完全适合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壕堑战不是单纯防御，实质上是顽强的进攻，求得一步一步的前进。壕堑战是为了更强韧的战胜敌人，不能不在当前的条件下，进入壕堑。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

“你敢走出来。”而你居然就走了出去，那么这就像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鲁迅的壕堑战是惯于灵活运用作战原则，这对于坚持敌后的斗争，更加重要。不管是壕堑或是游击，应该是一切灵活的战术，致胜的战术。

鲁迅一生所进行的战斗，是坚决的，彻底的。打了败仗的人，弃甲曳兵，狼狽窜逃的穷像，确有点像鲁迅所形容的“落水狗”。鲁迅对于落水狗是不饶恕的。他说：狗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这一点对于抗战无信念的人们，是个教训。因为抗战到今天，如果把敌人当作落水狗，固然要打到底，如果敌人把我们当作落水狗，而我们自己不承认是落水狗的话，也得打到底。假如战争也有适“可”而止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达到鸭绿江边而后“可”。

战斗吧！以战斗来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战术——强韧，灵活，彻底。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录自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周海婴同志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

主席：

近年来我常想到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方面有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曾向有关负责同志提出多次建议，始终没有解决，感到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向您反映，请求您的帮助。

一、关于鲁迅的书信的处置和出版。出版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始终是母亲多年的愿望。一九六八年母亲去世前几天，得悉戚本禹利用他在中央文革的职权，从旧文化部保险柜弄走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一千多封，气愤之下，立即向姚文元××反映，母亲原有心脏病，受了刺激，在写信的第二天心脏病复发，因心力衰竭去世。至今七年多了，书信集的出版仍然毫无消息。我非常盼望书信手稿能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以便于做两件事：一是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供研究工作使用；二是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给日本人的），供广大读者阅读。一九四六年母亲在上海编过一部书简，收入当时收集到的书信855封。周扬主持文化

工作时，编的《鲁迅全集》，只收书信334封。现在收集到的书信，我见过一个目录，已有一千二百多封（不包括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其中二百多封从未发表过，我也没有看到过信的全部内容。我常收到来信要我设法购买或借阅鲁迅书信，但上述两种版本早已不再印售，新的又一直未出，所以根本无法找到。我不了解鲁迅书信长期不能出版的原因，如果认为鲁迅的收信人有的后来成了坏人不能出，我想这不应成为障碍。因为马恩著作就有许多马恩给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并未因此不出。敬爱的主席，您最了解鲁迅书信的革命精神。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您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讲演中，就引用过鲁迅痛斥变节者的一封信，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手稿校订过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

二、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最近出版的鲁迅著作，是按照三八年《鲁迅全集》重印的，那个版本是母亲在抗战初期仓卒编成的，收入的作品不完全，编校也有缺点，更没有必要注释。解放后出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注释中有严重政治错误，所以现在急需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有注释的新的《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这就需要动员一批认识和熟悉父亲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因为鲁迅著作中特别是书信、日记中涉及的某些人和事，除熟悉鲁迅的少数老同志外别人弄不清楚。其中虽有不重要的，但也有重要的，应当弄清楚。据我了解，这些老同志也希望在生前能有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鲁迅情况提供出来。如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等老同志，有的年已八十多岁，最年青的也在六十岁以上，他们体力有限，也没有必要的助手，感到力不从心，这件事如不加紧做，势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但这类事一直无人过问，因此，我也请求您能给予帮助，指示出版局立即把这一任务担负起来。

三、关于鲁迅研究。我有时看到香港和国外出版的鲁迅传和年谱一类著作，许多是以资产阶级观点歪曲鲁迅的，流毒相当广，并没有人做消毒工作。国内发表的论述鲁迅文章，也常有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曲解鲁迅思想的。母亲生前很注意这个问题，她逝世前几天还在撰写文章，批判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歪曲（母亲觉得瞿秋白认识鲁迅前，全盘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甚至说鲁迅是学阀。认识鲁迅后，也始终不承认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说鲁迅是“同路人”。母亲认为应当予以批判）。我们到现在还未拿出一部按照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写出来的观点正确、材料详细可靠的鲁迅传，使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读者很感困难。为此，我想建议让文物局和出版局共同把这一工作做起来。具体地说，就是将一九五八年下放给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熟悉了解的老同志作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外，专门负责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争取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能把上述几种书（《鲁

迅全集》注释本、传记、年谱)以及全部鲁迅手稿影印本出齐。

这些想法,多半是母亲去世前常常和我谈及的,也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每当我想起母亲的心愿还未实现时,心里总是深感不安。我和叔父在一起时,也常谈到这些想法,他赞同我给您写这封信。

敬爱的主席:您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写过,您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在一九七一年听到传达您的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我觉得父亲也是这样想的。我听母亲和熟悉鲁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您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那一年,心中总是深深想念您。他曾打电报给您表示祝贺,还常常兴奋地和参加长征见过您的同志谈起您,渴望知道关于您的一切。虽然他终于未能见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的心是和您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眼中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意在您的指导下做一名小兵,用笔。我想起这情景,就情不自禁地下定决心写这封信,向您提出以上的请求。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妥之处,我多么渴望跑到您的跟前,倾诉我心中的一切感受,倾听您对我的亲切教诲。主席啊,我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周海婴

1975.10.28

编者附记: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就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是批在周海婴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的。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婴同志对鲁迅书信的处理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和鲁迅研究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直接写信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映。周海婴同志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扼杀、歪曲鲁迅著作罪行的控诉和揭露。过了三天,毛主席就作了上述重要批示。毛主席的批示,给予“四人帮”在鲁迅著作出版研究领域中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沉重打击。

读 点 鲁 迅

三月的租界

鲁 迅

今年一月，田军^①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②，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两^③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④——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⑤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⑥，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⑦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⑧。这就和文坛^⑨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⑩在上海的租界^⑪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⑫的奇怪毫光^⑬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⑭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⑮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⑯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⑰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

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⑧的幸福时期。

这样的时刻^⑨，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⑩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⑪。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⑫。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⑬。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⑭，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⑮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⑯。

四月十六日。

注 释

鲁迅的这篇杂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夜莺》月刊的前身是当时“左联”一些作者创办的“海燕”月刊。《海

燕》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创刊，只出两期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鲁迅曾说：“《海燕》系我们几个人自办，但现已以‘共’字罪被禁”。《海燕》被禁后，于三月改出《夜莺》。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春天写作《三月的租界》时，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大片锦绣河山，而且于一九三五年又发动“华北事变”，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

毛主席在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这时王明在国外，（当时王明是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却连续在法国的《救国时报》、第三国际用英、德、法、西班牙文字出版的期刊《国际时事通讯》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竭力否认、取消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妄图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的附庸。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周扬等人忠实执行王明路线，背着鲁迅解散“左联”，根据王明在国外写的文章中提到“国防文学”而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的资产阶级口号，声称，在“全民族性质的旗帜下”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

“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而鲁迅却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宣布“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强调“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当时这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正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文艺界的突出反映。

鲁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主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他们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围攻病中的鲁迅，其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就是围攻鲁迅大打出手的一名小丑。

事情最初是由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引起的。一九三五年三月，鲁迅亲自校改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并写了序言，热情地肯定：“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这部小说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上海出版后，张春桥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导下，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化名狄克，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向广大读者推荐田军的《八月的乡村》“无异是把一个好的作家送进坟墓”，抹杀《八月的乡村》这部革命作品。同年四月十六日，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这篇光辉杂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狄克之流“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就有力地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剥开了四十年前化名狄克的反革命投降派张春桥的画皮。

鲁迅以《三月的租界》作为文章题目，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八月的乡村”，处在抗日的前线，是战斗的地方。东北人民“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以实际行动批判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在“三月的租界”呢？狄克之流却躲在帝国主义军警保护下的上海租界里，“住洋房，喝咖啡”，烟花三月，春色正浓，从容地“执行自我批判”，干尽了“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的反革命勾当。正如鲁迅所说：“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两相对照，革命与反革命判然分明。鲁迅这个富有战斗性的题目本身，就象一把犀利的匕首，刺痛了狄克之流的要害，难怪狄克看到《三月的租界》后，在给鲁迅的信中发出了哀鸣：“头几天，偶然到新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